

## 铜器铭文中所见的王莽改制<sup>\*</sup>

陈家宁

**内容提要** 新莽时期在青铜器发展史上地位并不突出,但现存的一些度量衡器和铜镜铭文,与其前后的两汉时期相比,却有着鲜明的特色。本文阐述新嘉量所反映的王莽代汉立新、规定度量衡等史事,并将一系列铜镜与传世文献所载的“符命”、即真、分封、民族战争、官爵制度改革、复辟“井田”、币制改革等新莽时期重要史事对比印证,说明铜器铭文在新莽时期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王莽改制 度量衡器 铜镜 铭文

新莽时期(公元6年“居摄”至公元23年新朝灭亡)时间短促,现存的铜器数量不多,主要包括度量衡器和铜镜等类。由于其铭文用语多具有时代特征,很多能反映王莽改制所涉及的制度、信仰等方面特色的内容,因此与其他无纪年的两汉铜器相比,一般比较容易断代。本文对这两类铭文中较重要者进行考述,结合传世文献中关于王莽改制相关史实的记载,阐发铜器铭文的史料价值,以深入理解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及相关事件的来龙去脉。

### 一 王莽“新政”与度量衡器

《汉书》本传载王莽“父曼蚤死,不侯。……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早年的读书经历使得他继承了儒家“复古”思想,并形成自己的理解。其任大司马、宰衡期间,仅初步尝试,待其居摄、即真以后,便无所顾忌,利用皇权,按其理想来改造社会,全面实行“新政”。

王莽新政中的“五均六管”、币制改革等,见于《汉书·食货志》及本传,出土新莽钱币、钱范众多,亦可为证。而史载刘歆制定的度量衡制度,也有传世及出土度量衡器相印证。《汉书·律历志》曰: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其法用铜,高一寸,广二寸,长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职在内官,廷尉掌之。

<sup>\*</sup>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编纂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0&ZD103)之子项目“《全西汉文》编纂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成果。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铜,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廔焉。其上为斛,其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职在太仓,大司农掌之。

衡权者: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职在大行,鸿胪掌之。

传世新莽嘉量有斛、斗、升、撮、龠等<sup>①</sup>。另外 1926 年夏,在甘肃定西县称沟驿发现新莽铜器八件,包括五权、一衡、一钩、一丈,八器中有二权、一衡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另三权、一钩、一丈藏于台湾<sup>②</sup>。以上诸器多有新莽八十一字诏书,其文曰(见图 1):



图 1 新莽嘉量铭<sup>③</sup>

黄帝初祖,德布于虞。虞帝始祖,德布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即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

此铭在《隋书·律历志》中即有著录,但今“百衲本”偶有异文,如于“直定”前讹脱“戊辰”,“新”作“辛”,“民”作“人”等(后者改字显为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

王莽在即位诏书中自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将自己与黄帝、虞舜联系起来。《汉书·元后传》载其《自本》曰:“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妫汭,以妫为姓。至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二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奉胡公满为统祖,田敬仲完为世祖,顾颉刚曾用图示的方法排比出“火土金水木”五德终始的次序和王莽为自己制定的家族世系<sup>④</sup>,正可体现出王莽为巧取政权所散布的“天命”周匝轮回理论。

自东周以来,“分野”理念的发展逐渐使古人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宇宙观,在王莽代汉的过程中更被其充分利用。居摄三年(公元 8 年),岁星至大梁,太岁在戊辰,也正是符命叠出的一

① 白尚恕:《从王莽量器到“刘歆圆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 年第 2 期,第 75 页。

② 傅振伦:《甘肃定西出土的新莽权衡》,《中国历史文物》1979 年增刊,第 90 页。

③ 孙慰祖、徐谷甫:《秦汉金文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年,第 208 页。

④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1930 年第六卷第一期;《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年。是年十一月甲辰朔,廿一日甲子改元初始,廿五日即戊辰。《汉书》本传载是日王莽至高庙拜受金匱神璽,御王冠,谒太后,下书称:

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匱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旒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王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改朝换代了,各种制度都要变,包括“正朔”和“器制”。《尚书·舜典》载舜受尧禅后“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王莽诏书所称“前人”,当即指舜。其颁行的标准器也有经典为依据。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岁星至己巳,太岁在实沈,也被赋予黄道吉日的色彩。诏书称“初班天下,万国永遵”,王国维案“汉末郡国之数,凡百有三,莽制承之,则此量当时所铸,必有百余”<sup>①</sup>。史载晋、隋间即有出土。《隋书·律历志》案:“《赵书》,石勒十八年七月,造建德殿,得圆石,状如水碓。其铭曰:‘律权石,重四钧,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续咸议是王莽时物。后魏景明中,并州人王显达,献古铜权一枚,上铭八十一字。其铭云:‘律权石,重四钧’。……此亦王莽所制也。”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本铭为诏书,内容重要,布局和所用字体也体现出典雅、端庄的特色。行款匀称、严密,字形瘦长,重心高,末笔悬垂,具有夸张的装饰性。与两汉甚至新莽时期的其它铜器——包括度量衡器其他位置的一般汉篆截然不同。“戊辰”没有用重文符号,“子”、“孙”二字下的重文符号故意写得转曲,这些均与先秦铭文不同。可见王莽虽在主观上欲行复古,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已经不得不“与时俱进”了。

## 二 新莽铜镜中的史迹钩沉

两汉是铜镜发展的重要时期,使用普遍,造型和铭文均有显著进步。而今存新莽时期的铜镜虽数量有限(约百面),但却特色鲜明,与西、东两汉相比,尤其令人瞩目。新莽铜镜中主要为博局镜<sup>②</sup>,亦称“规矩镜”或“TLV镜”,因其造型纹饰基于“六博棋局”而得名。有铭文甚至自名“博局”,如:“新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左龙右虎掌四彭,朱爵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中央,刻娄博局去不羊。家常大富宜君王,千秋万岁乐未央。”<sup>③</sup>另如:“作佳镜,清且明。葆子孙,乐未央。车当传驾骑趣莊,出园四马自有行。男□□侯女嫁王,刻娄博局去不羊。服此镜,为上卿。”<sup>④</sup>李零强调,这类镜铭中的“去不羊(祥)”等内容,“更清楚地显示出这种纹饰是代表着宇宙模型,同时还具有厌除不祥的神秘含义”。<sup>⑤</sup>叶康宁则进一步指出:在新莽时期,不仅博局镜大量流行,而且在当时的货币、建筑等方面均盛行博局图式,这与王莽篡汉活动中的政治宣传

① 王国维:《新莽嘉量跋》,《观堂集林》(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88页。

② 周铮:《“规矩镜”应该称“博局镜”》,《考古》1987年第12期,第1116~1118页。

③ 王纲怀:《三槐堂藏镜》,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12页图版70。

④ 陈静:《新莽时期博局纹镜研究》,《中国美术》2010年第1期,第111页图6。

⑤ 李零:《式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74页。

有密切关系。<sup>①</sup>王莽时期正是谶纬思想大发展之时,王莽本人就非常热衷于此,上行下效也是当时迷信盛行的重要原因。在其登上权力顶峰的过程中,惯用“祥瑞”、“符命”等手段,将自己代汉立新的每一步骤都描绘成“天命”,必须顺从,不可违抗。王莽巧妙地利用了这类舆论宣传工具,使篡汉得以成功。从史料来看,王莽并不完全是故意编造谎言来进行政治欺骗,他自己也是相信的。《汉书》本传载起义军兵临城下时,“莽绀鄼服,带玺麟,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案栢于前,日时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仍然想靠宗教仪式来厌胜敌军。其自以为有上天佑助,与纣王所谓“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sup>②</sup>如出一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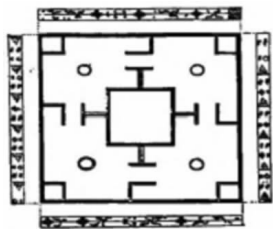


图2 湖北云梦大坟头汉墓 M1 出土博局<sup>③</sup>



图3 新莽时期鸟兽博局镜<sup>④</sup>

王莽即真以后,为解决当时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同时使其新朝与汉朝划清界限,在诸多方面实施了新政,尤其在官制、地名等的名称上实行改革。带有“汉”称谓之处一律改作“新”,见上揭镜铭。其文用语本自西汉时期,1978年安徽六安单王乡出土的西汉七乳禽兽纹镜铭文即曰:“汉有善铜出丹阳,炼以锡银清且明,召工刻之成文章,青□。”<sup>⑤</sup>至东汉时代,拨乱反正,又将“新”改回“汉”。如1956年湖南长沙砚瓦池2号墓出土的东汉镜铭曰:“汉有善铜出丹阳,取之为镜清如明,左龙右虎补四旁,朱爵玄武顺阴。”<sup>⑥</sup>

以“新”字开头的镜铭另如:“新铜治镜子孙息,多贺君家受大福,位至公卿修禄时,幸得时年获嘉德,传之后世乐无极。”<sup>⑦</sup>又如:“新兴辟雍建明堂,然于举士列侯王,将军令尹民户行,诸生万舍在北方,乐未央。”<sup>⑧</sup>“新兴辟雍建明堂,然于举士列侯王,子孙服具治中央。”<sup>⑨</sup>“辟雍”、“明堂”等反映了新朝建立后王莽模仿周礼建构国家教育制度、政治机构的情况。与“子孙服具治中央”相似,新莽镜铭中还常见“八子九孙治中央”,也体现了王氏家族鸡犬升天的史实。虽然自汉成帝时便有“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sup>⑩</sup>,但至王莽即真后才实行了对王氏家族的全面分封。《汉书》本传载王莽“又按金匱,輔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輔、驃骑将军安阳侯王舜为太师,封安新公……丕进侯王寻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将军成都侯王邑为大司空,隆新公……京兆王兴为卫将军,奉新公……京兆王盛为前将军,崇新公,是为四将。凡十一公。王兴者,故城门令史。王

① 叶康宁:《王莽与博局》,《古代文明》2009年第1期,第37~44页。

② 见《史记·周本纪》。

③ 湖北省博物馆:《云梦大坟头一号汉墓》,《文物资料丛刊》(4),1981年,第12页图37。

④ 洛阳博物馆:《洛阳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88年,图版30。

⑤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六安市文物局:《六安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61页,图版40。原释文“炼”与“锡”字间缺“已(以)”字,今据照片补释。

⑥ 铭文未当补“阳”字,两汉铜镜中常见末句缺字者,多半是由于制范时布局失误造成的。见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出土铜镜图录》,文物出版社,1960年,第95页图版69。

⑦ 王勤金、李久海、徐良玉:《扬州出土的汉代铭文铜镜》,《文物》1985年第10期,第95页图21。

⑧ 陈佩芬:《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图版39。

⑨ 陈佩芬:《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图版40。

⑩ 见《汉书·刘向传》。



盛者,卖饼。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余人,两人容貌应卜相,径从布衣登用,以视神焉。”又“封王氏齐祚之属为侯,大功为伯,小功为子,缌麻为男,其女皆为任。男以‘睦’、女以‘隆’为号焉,皆授印麟令诸侯立太夫人、夫人、世子,亦受印麟。”

西汉时代铜镜中的“国家”,在新莽时代则改作“新家”。如:“王氏昭竟四夷服,多贺新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孰,长保二亲子孙力,传告后世乐毋亟,日月光大富贵昌兮。”<sup>①</sup>“王氏作竟四夷服,多贺新家人民息,风雨时节五谷孰,长保二亲子孙力,传告后世乐无极。”<sup>②</sup>至东汉,又将“新家”改为“国家”。如东汉时期龙虎镜铭曰:“王氏作竟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孰,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这类铭文中多有“四夷服”、“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等内容,反映了新、汉王朝与周边匈奴等民族间的斗争呈现出一种紧张、激烈的态势。

王莽在民族政策上,继承了儒家“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泥于周制,诏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遣使东“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余;南出者,鹑徼外,历益州,贬句町王为侯;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去‘玺’曰‘章’”。周边民族不堪侮辱,引起战事。其后王莽又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改“高句骊”为“下句骊”,以为这样就可以战胜他们,可见其非常迷信文字名号的功能。对新朝来说,镜铭中那类吉祥语格外重要,但它们在历史规律面前却显得如此软弱无力:新朝没有实现“人民息”、“胡虏殄灭”、“五谷孰”等宏愿,反而很快就被埋葬在民族和阶级的反抗战争之中。

还有一类有纪年的铜镜,铭文出现“新家”者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一面:“唯始建国二年新家尊,诏书数下大多恩。贾人事市,不躬耆田,更作辟雍治校官。五谷成熟,天下大安,有知之士得蒙恩。宜官秩,葆子孙。”<sup>③</sup>铭辞反映了对王莽改制的歌颂、感恩,以及对社会安定、子孙富贵的厚望。其实这也是镜铭中常见的思想主题。另如:“始建国天凤二年作好镜,常乐富贵庄君上,长保二亲及妻子,为吏高迁位公卿,世世封传于毋穹。”<sup>④</sup>“居摄元年自有真,家当大富耀常有陈,口之治吏为贵人,夫妻相喜日益亲善。”<sup>⑤</sup>新莽时期是社会阶级、阶层大流动的时代。很多原先世卿世禄的刘汉宗室贵族被除爵贬庶,原做郡守者均徙为闲官“谏大夫”,甚至禅汉的天子孺子婴也被贬为“定安公”,籍地百里。由于法律严苛,很多人成为徒隶、官奴婢。相反,对以那些善于见风使舵、投机钻营、“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或者运气好者,新莽政权却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升迁机会。哀章就是因在关键时刻把王莽推上皇位而使自己一步登天的人。所以镜铭所称“为吏高迁位公卿”对普通人来说,也并不是不可想象的。

王莽即真后模仿周公“制礼作乐”,拜“四辅”、“三公”、“四将”,凡十一公,又置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下还有命士、中士、下士、庶士,不一而足。又分封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皋陶、伊尹、周公、孔子等圣王贤相之苗裔。分封则应建侯卫、授茅土,王莽后来也确实下书曰:

① 陈佩芬:《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图版 41。

② 黄濬:《尊古斋古镜集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57 页。

③ 陈静:《新莽时期博局纹镜研究》,第 112 页,图 1。

④ 王士伦:《浙江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87 年,第 38 页,120 号。

⑤ 王士伦:《浙江出土铜镜》,第 38 页,118 号。

昔周二后受命,故有东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盖亦如之。其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邦畿连体,各有采任。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同,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则,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众户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杀以两,至于一城。五差备具,合当一则。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为任者,八十三人。及汉氏女孙中山承礼君、遵德君、修义君更以为任。姜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

土地私有,则皇帝无地可封,故与之相伴的是其“王田”政策。《汉书》本传载王莽曰:

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时则有嘉禾之祥,遭以虏逆贼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王莽书生出身,精通儒典,尤好古文经,刘歆之学得以立于学官,全赖莽力。故王莽颁行政令或诏命措辞多从儒典中寻找依据。《春秋谷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韩诗外传》卷四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广三百步,长三百步,为一里,其田九百亩。广一步、长百步,为一亩;广百步,长百步,为百亩。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这是复辟“井田制”的依据。就连对反对井田制者的惩罚手段——流放,也是依据《尚书·舜典》中“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的记载。

“井田”在新莽时期铜镜铭中也加以称颂,如1978年阜阳市郊刘庄出土的一面,铭曰:“刘氏去,王氏持。天下安宁,乐可喜。井田平,贫广其志。”<sup>①</sup>铭辞口吻中仿佛流露出经过“土地改革”后,广大贫苦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热情洋溢地建设新社会的喜悦心情。难怪胡适评价王莽是“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sup>②</sup>。但土地私有自东周以来已实行数百年,秦汉以后,地寡民众,复辟“井田制”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王莽的分封方案终“以图簿未定,未授国邑,且令受奉都内,月钱数千。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成了一场戏。禁止土地买卖不但没有带来社会公平,反而导致更大的混乱,王莽最终不得不下诏:“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sup>③</sup>

① 现藏阜阳市博物馆。另上海泓盛2012年铜镜专场春季拍卖会Lot910号的铭文、形制与此略同。

② 胡适:《王莽》,《胡适文存》(二集)卷一;《再论王莽》,《胡适文存》(三集)卷七,《民国丛书》第一编93、94,上海书店,1989年。

③ 见《汉书·王莽传》。

图4 “一刀平五千”金错刀<sup>①</sup>图5 “错刀”博局镜<sup>②</sup>

史载王莽自居摄时至灭亡前的十多年间,曾四次下诏改革货币,五次下诏重申货币改革的命令和禁止民间私铸货币的严酷刑法。由于其以小易大、币制不公,币材庞杂、徒增混乱,改革频繁、手续繁琐<sup>③</sup>,使得因违法铸币和连坐者涉及数十万人,对新朝社会动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有人称王莽的货币改制时“中国古代最失败的社会改革运动”。<sup>④</sup>《汉书·食货志》载:“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王莽所以铸刀币,同样也有文字名号的原因。《汉书》本传载王莽称其“前在大麓,至于摄假,深惟汉氏三七之阨,赤德气尽,思索广求,所以辅刘延期之术,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几以济之。”但待“莽即真,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sup>⑤</sup>,还将“钱”改称“泉”,以防世人见“金刀”而思“刘”汉,其本来面目暴露无遗。

金错刀初铸之时,人们对王莽的货币改革还抱有幻想,期望此举能挽救刘汉将尽的气数,对错刀不乏歌颂之辞,这在铜镜铭文中就能看到。如扬州出土的“错刀”博局镜铭曰:“令名之纪七言止,涑冶铜华去无宰,铸成错刀天下喜,安汉保□世毋有,长□日进宜孙子。”由于错刀与普通五铢钱的价值比例太悬殊,故甫一发行,即“民多盗铸者”。私铸错刀利润最大,但要求的技术水平较高,且须用金,故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然卒不与直”。<sup>⑥</sup>为防止民间盗铸,不得不禁止下民持黄金,官府用铜币兑换黄金,又不给足值,引起民众经济受损,怨声载道。其实金错刀是不得民心的。王莽的一项改革措施引发了一连串的社会效应,且必须用众多对策来补救,可见其改制的盲目性。

西汉、东汉时代的青铜器,以实用器居多,可以分为饪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度量衡器、杂器等。<sup>⑦</sup>其铭文多属“物勒工名”,字体草率,极少长篇<sup>⑧</sup>,这就使得新莽度量衡器上的诏书铭文,无论是其文辞、书法,还是器物形制,越发显得引人注目。而新莽时期的铜镜——尤其是博局镜,在镜铭内容、布局、字体、用字等方面,也均与西汉时期不同,对铜镜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今天可以透过新莽铜镜,窥见当时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诸多方

① 王栋梁:《从中国嘉德拍卖看一刀平五千的收藏前景》,《西部金融》2010年第3期,第84页。

② 王勤金、李久海、徐良玉:《扬州出土的汉代铭文铜镜》,第94页,图18。原文称其为“规矩宜孙镜”,今改。

③ 石俊志:《王莽的货币改制——中国古代最失败的社会改革运动》,《金融博览》2012年第2期,第34~35页。

④ 孟祥才:《王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4页。

⑤ 见《汉书·食货志》。

⑥ 见《汉书·王莽传上》。

⑦ 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93页。

⑧ 西汉时期篇幅较长的铜器铭文如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银鸟虫书铜壶、圣主佐宫中行乐钱等,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面。如姓氏镜说明了民间私人铸镜业的兴起和繁荣<sup>①</sup>,铭文中夸饰铜镜质量的文句具有广告文辞的色彩;铜镜纹饰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等图案的出现则反映了人们的信仰世界;十二地支、阴阳五行,以及带有谶纬、升仙等意象的吉语镜的流行,则反映了新莽时期通行的社会思想。总之,新莽时期的铜器铭文除了可与传世文献参校互证外,还可通过对铭文,甚至器物本身的研究,大大丰富对新莽时期史实的认识。这正是出土文献的价值所在。

(陈家宁,天津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 Wang Mang's Restructuring Displayed in the Epigraphs on the Bronze Wares

Chen Jianing

**Abstract :** Bronze Wares in Wang Mang's New dynasty are not particularly attractive. However, the epigraphs on the existing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and bronze mirrors display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with the two Han dynasties before and after it.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how Wang Mang replaced Han dynasty with New dynasty, and issued the new measurement.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mirrors, divine rights of emperor, transfer from regent to emperor, enfeoffment, wars against other tribes, reform on official system, restoration of the "nine squares" system of land ownership in China's slave society, monetary reform and other historical facts, we can see the epigraphs are playing important roles in the study of Wang Mang's New dynasty.

**Key Words :** Wang Mang's Restructuring;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Bronze Mirror; Epigraph

① 邱龙升:《两汉镜铭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67页。